

台灣文學研究  
第四期 2013年6月  
Taiwan Literature Studies  
No. 4, June 2013.  
頁碼：231～259

---

研究論文 Research Article

# 全球生態意識的在地展現： 吳明益《家離水邊那麼近》中的水域生態 與族群文化景觀

A Local Practice of Global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  
Water Ecology and Ethnic Culture in Wu Mingyi's *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

---

莊傳芬  
Jhuang, Chuan-fen



智慧藏

收稿日期：2013年4月12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3年5月26日

Received: Apr. 12, 2013; Accepted: May. 26, 2013

莊傳芬，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e-mail: jone1807@gmail.com

---



---

## 摘要

---

本論文以吳明益《家離水邊那麼近》的自然生態與人類文化之書寫為題材，探討東台灣水域生態與地方族群文化發展二者間的共生關係，以及文本中所展現的生態觀。從「水」的探尋發端，作者從其豐富的歷史人文與科學知識背景出發，藉由數次步行並觀察東台灣溪流與海洋生態的經驗，而在過程中具體落實了對花蓮生態現況的知性思辨。作者並以此為基點，進一步將在地與全球連結，從生態的普世性價值中開展其全球生態意識的論述。

本論文聚焦於文本中描寫溪與海的兩個章節，探討花蓮在地原住民文化、河流與海洋生態，以及現代科學知識三者之間的作用關係。並進一步思考：在吳明益的自然書寫中，河流與海洋不同的地理形制有什麼樣不同的表現方式與元素？文本中傳統族群文化的詩意想像與現代科學的知性思辨相互連結後，展現出什麼樣的生態批評與具體生態觀？文本中以東台灣水域為觀察基礎所開展的在地生態意識，如何與全球生態倫理觀相連結？此皆為本論文試圖論述之處。

**關鍵詞：**自然書寫、花蓮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TEK）、水域生態

---

## Abstract

---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ecology and ethnic culture in Wu Mingyi's *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 It presents how Wu's ecological observation, in particular the symbiosis between water ecology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aboriginals. Starting from exploring water ecology, Wu provides substantial reflection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Hualien through lo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s well as through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fieldworks in river and marine ecosystems in eastern Taiwan. Furthermore, he attempts to connect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by developing a discourse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global ecology based on universal valu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river and marine ecosystems, and explor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aboriginal culture, river and marine ecosystems, and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This paper is interested in that follows: What kind of expressions and elements are used to represent different geographic forms of river and sea? What kind of eco-criticism and ecological thinking are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poetic imagination and the intellectual science? How can the locally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connect to the globally ecological ethics?

**Keywords:** nature writing, Hualien's aboriginals, TEK, water ecology

---

## 正文

---

### 一、前言

吳明益《家離水邊那麼近》一書為書寫東台灣水域的生態散文，全書三個章節分別聚焦於花蓮內部的五條河川、花東海岸線以及東華大學內部的「隱湖」，描寫河、海、湖三個不同的水域景觀。第一章〈家離溪邊那麼近〉中，書寫吳明益步行花蓮縣境內的五條溪流——美崙溪、七腳川溪、花蓮溪、木瓜溪以及嘎唧唧溪——的經驗，沿途觀看到各溪流在不同河段的不同地理與人文景觀，包含河川生態現象、河川整治工程或人為汙染，以及依傍溪流生活的原住民部落等，作者進而從中開展其有關河流的生態批評、社會批判以及原住民族群文化與歷史思考。第二章〈家離海邊那麼近〉中，吳明益一方面向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取經，鋪寫大量台灣在地與全球有關海洋的生態知識以及歷史、神話傳說的想像性思考，另一方面也紀實性的書寫兩次步行東台灣海岸線的經驗，並從生態批評的視角出發，在沿途所觀所感中進一步思索東台灣的海域生態與在地原住民族群的海洋文化。而文本第三章〈家離湖邊那麼近〉中所書寫的「隱湖」，則是在東華大學創立時甫由人力開鑿而成，數年來該湖逐漸自成一個水域生態系，

文本的敘事主要聚焦於隱湖內部的生態觀察，相對來說則較少述及其與東部族群文化發展之關係。

吳明益在序言中提出關於本書的寫作內容是「諧調並呈現人、人的文化、歷史及其與生物、生境演替的關係」。<sup>1</sup> 因此，本論文聚焦於文本中描寫溪與海的兩個章節，探討在《家離水邊那麼近》一書中，作者如何藉由書寫在地原住民族群文化與地方環境生態之間的相關性，進行東台灣水域的生態批評，並進一步將豐富的科學知識符碼鑲嵌於文本中，形塑此二者間看似扞格不入、實則相互支撐的對話關係。具體而言，本文主要將探討在地原住民文化、河流與海洋生態，以及現代科學知識三者間的作用關係。並進一步的思考：在吳明益的生態文學中，河流與海洋兩種不同的地理形態有什麼樣不同的表現方式與元素？作者對於傳統族群文化的詩意想像與現代科學的知性思辨相互連結後，開展出什麼樣的環境批判與生態觀？文本中以東台灣水域為觀察基礎所開展的在地生態意識，如何與全球生態倫理觀相呼應？

## 二、水域生態與族群文化關係

### (一) 在地溪河流域的生態知識性論述

在〈家離溪邊那麼近〉中，作者書寫其步行花蓮縣境內五條溪流的經驗，以及過程中他所觀察與感受到的物事。作者有時往山的方向有時往海的方向走，在不同的流域看見各個依傍溪流群居的原住民部落，包含七腳川溪的阿美族、木瓜溪的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等，抑或是遇見居於水畔的原住民文化工作者。此中所書寫的原住民文化與

在地自然生態之間的密切關係，共同構成生物區域（bioregion）之面貌。Robert Thayer 在 *LifePlace: Bioreg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一書中，對於生物區域進行如下的定義：

「生物區域」依照字面與字源上的意義是「生活—地方」（life-place）——一個能夠透過自然的（而非政治的）界線而被定義的獨特區域，具有地理、氣候、水文與生態上的特徵，使其能夠支持獨特人類群體。生物區域有多種的定義，可以透過分水嶺的地理形式、相似的動植物生態系統、以及相互關聯且可辨識的土地形式（例如，特別的山區、草原、或沿海地區）加以定義；或是透過因該區域自然的限制與潛力而發展出的獨特人類文化來定義。最重要的是，生物區域的出現，是作為一個永續、再生的群體得以生根與實現（take place）的最合理之地點與規模。<sup>2</sup>

（筆者自譯）

吳明益筆下傍溪而居的原住民，因生存場域的選擇而進一步發展出與溪流密切相關的文化，其對溪流的認同感可視作人類與廣大自然之間直接的相屬關係。由於溪流水域在空間上本身具有獨立的特質，每一個水域因不同的地理形式與氣候、水文等不同的自然條件，因而得以各自發展出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與族群文化的特殊性，溪水因此流出生命，以及與溪水緊密相連的故事與文化。每一條溪流從發源到出海，在各溪段孕育出多種不同的生態樣貌，而人類依水所建立的部落或社群亦是此生態系統中的一員，與所有的生物（動物、植物）與

1. 吳明益《家離水邊那麼近》（台北：二魚文化，2007），頁9。

2. Robert L. Thayer, *LifePlace: Bioreg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3.

非生物（土地、河流）共構出一個獨具地方特色的生物區域景觀。

文本中循著河道細數每一條溪所含納的生命與歷史，並反思台灣後山這塊土地如何在數次的外力介入（從清朝、日治時期以至當代）與逐步向現代化邁進的歷史進程中，因無當的環境開發與族群侵略，而使地方河川生態與原住民文化遭受劇烈衝擊，進而對此一變異的過程提出質疑與批判。如文本中對於花蓮美崙溪流域原住民族的描述，便清楚地呈現了地方生態與族群文化二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以及人類與自然的連結性與互動模式之變遷。1878年加禮宛事件<sup>3</sup>後，阿美族的七腳川社取代了原居此地的噶瑪蘭人勢力，成為花蓮美崙溪畔的新居民。阿美族素有部落傍水（溪流或海洋）而居的生活習慣，其經濟生產的模式除了仰賴陸上的農耕與狩獵之外，河流或濱海的漁撈活動也成為族人主要的食物來源之一。<sup>4</sup>因此，其族群文化與信仰除了與土地相繫共生外，也與溪河、海洋的水域與其生態系統產生緊密的連結。作者在文本中以阿美族的捕魚祭為例，說明族人依附美崙溪而生與向之取食的生活習慣，如何塑造阿美族人對河川自然的態度與想像，進而影響了其舉辦祭典儀式的型態：「魚對他們而言都不只是獵物、食物，還同時意味著一種季節韻律，一種賜予，一種想像與對自然的信任、感謝或畏懼。」<sup>5</sup>在不同的水域生態區域中，魚群依循著地方季節的更迭而來去，農作物依循著地方的土壤、氣候等因素而生長，在此循環韻律中，族人的生存亦是依循著季節的變化等待自然界的賜予，因而發展出在地住民與其所居處的自然環境共生的生活與文化樣態。因此，如前述阿美族人所舉辦的捕魚祭典，即為族人在「生物區域」中的一種實踐。族人並以此祭典，表達對自然界賜予他們漁獲、養育族人的感謝。而透過這樣的祭典所形塑的族群與自然



間緊密相連的文化模式，也成為生物區域中族群對於在地河流、生態系統的一種想像與認同。

然而，作者透過歷史文獻的爬梳與其步行溪流時所觀察到的河川現況，說明這樣的族群文化在面臨外來勢力的入侵與現代化的開發建設下，隨著自然生態所遭受的破壞，漸漸喪失了其文化內涵的精神。從日治時期日本人對東部自然資源的開採，到戰後以至現今漢人政權下的種種現代化建設，原住民在這塊土地上所發展的文化與其居住權益受到嚴重忽視。作者以美崙溪的現況為例，說明在都市規劃的政策推行下，新的土地占領者愈發執著地以文明力量規訓、或者毀棄自然：

有人說，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魚吃起來總沒有以前好吃，有泥土味。我猜，說不定是因為牠們肚子裡積存太多的廢棄物、污水和怨氣的原故。當然也有人喜歡現在草坪整齊的河濱公園，畢竟住民已不需要靠美崙溪裡的魚才能溫飽，他們樂於有一條視線開闊的散步道，並且可以在橋下跳土風舞。只是對美崙溪而言，每年能讓抱卵的印

智慧藏

3. 吳明益描述噶瑪蘭族人原居於蘭陽平原，在清朝領台時期因漢人土地開墾而被迫遷徙到花蓮北埔，不久又因漢人勢力持續推進的壓迫使雙方爆發衝突，釀成了原住民遭到清軍殘酷鎮壓的加禮宛事件，而餘生者再度遭到強制遷社的命運。事件過後，這片溪畔土地的族群勢力從噶瑪蘭族加禮宛社轉而被阿美族七腳川社所取代。參考註1，頁26-32。
4. 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在其研究阿美族的專書中指出：「漁撈是僅次於農業的生產活動，也是男子的工作，一般都在河川捕魚，濱海部落並以竹筏在近海巡捕魚類。本族漁撈在狩獵活動衰微後尤其盛行，經常在婚喪喜慶及重要儀式完成時，結隊『出漁』做為結束。」見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阿美族》（台北：臺原出版社，2001.10），頁185。
5. 同註1，頁32-33。

痕仿相手蟹到海邊釋放下一代，日本禿頭鯊在各溪段溯流，或許才是她流動的主要意義。<sup>6</sup>

引文中從美崙溪的例子帶出東台灣溪流所面臨的幾種族群文化凋零與生態危機之景況，包括河川汙染、興建水泥河道與公園、生活習慣改變導致當地原住民漁撈文化的精神漸漸流失等，而這些人為因素的介入皆進一步的改變了河川的自然生態。作者在訪問阿美族老人的過程中，發現當地原住民其生活與居所遭受的劇烈衝擊，他們首先能直接感受到的，是美崙溪中的魚在數量與種類上皆大幅銳減，且嚐起來的味道也與過去不同了。作者以之開展其生態批評，美崙溪作為一條「現代城市的溪流」，其原來之於生物的居所價值在人類的「整治」下產生變質。引文最後，透過原生於該溪流的生物之生存價值，重新思考溪流「流動的主要意義」是在於維繫其河流生態系的完整性，而非僅止於滿足人類無當開發與休閒娛樂的需求。

以美崙溪為例，作者將之進一步作為多數東台灣溪流處境的縮影，思考河川流域所含納的生態意義與族群歷史，並對其所受到的破壞提出批判。伴隨著族群勢力的消長與歷史推演，河流的生命力逐步在城市文明的規訓、汙染過程中日漸消殞，包括排放大量廢水、廢棄物導致河川汙染；政府為「美化」市容在河畔規劃步道或河濱公園；以防洪防災為名而興建水泥河道、攔砂壩來掌控溪流行跡等。因此，溪河奔流的河道被水泥固化，河濱的野生植物也從該水域的生態系中消失，轉而整治為齊頭平整的草地。此外，對於原居流域旁的原住民族來說，溪流往往是孕育其生存所需與族群文化的重要源頭；然而，在熱衷於開發「原生地資源」的現代化思維下，一條河流的溪水、砂

石、河畔、生態物種等無一不能轉換為可供人類利用的資源與利益。在這樣的現代化進程裡，原住民的族群文化有些遭到毀棄、有些則配合觀光產業發展加以商業化。種種人類恃其科技建置的力量而任意改變河川樣貌，進而行使對地方族群文化與自然生態的宰制性舉措，除了造成原住民與溪流、土地之間關係的裂離，也使一條河流的自然生命力漸趨湮滅殆盡。

文本中對於美崙溪之族群歷史與生態樣貌的並置書寫，提供了一個結合當地原住民族群文化以探討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面向，透過原居此地的阿美族之族群文化內涵，重新省思人類在捕魚祭典這樣的儀式中對溪流、漁獲所流露的敬重之情。另一方面，作者也對政府行使的河川整治政策提出批判，從而展現了其觀看一條河流的眼光，是透過該水域生態系的完整性以確立其價值。此二者的結合，或許正是現階段人類思考與自然間建立新關係時，所應提取並加以省思的文化養分。因此，溪流從一個外部環境的角色轉而成為一個生態與文化同步發聲的空間，過去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原住民與自然相依共存的生活模式，以及對自然抱存的敬畏與感激的素樸心理，遂使地方生態與族群文化產生了緊密的連結。

在《家》書的序言中，吳明益提出本書對文化與環境之間關係的思考：「我並非意圖寫一本關於紀錄的書，而是一本關於思考與想像的書……。在這個以「非生物」的生境為書寫對象時，我漸漸感受到人類這種生物是如何倚靠『非生物』才得以孕育出文化。」<sup>7</sup> 吳明益回到最初族群居所發展文化的根源——河流，觀察原住民、漢人、日本人在東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勢力消長過程，以及人類在追求現代化、

6. 同註1，頁34。

7. 同註1，頁9。

資本化的思維下對自然他者的毀棄，除了呈現當地溪流生態系漸漸崩毀的趨向，也使台灣島嶼中獨特的原住民文化養分逐漸流失。

透過〈家離溪邊那麼近〉這一章的書寫，可觀察到文本中對於族群命運變遷的刻畫與地方歷史的呈現之所以在生態的意義上顯得重要，在於這些孕育人類文化的溪流在外來移民（或殖民者）的入侵以及都市規劃工程的整治下產生明顯變貌，原居於該河流域的原住民亦同時受到相當大的影響，族群生活形態的改變等同於溪流地景的改變，而一個族群生命力的摧毀其實亦與溪流生態的浩劫同步進行。〈家離溪邊那麼近〉透過族群文化與自然生態的關係辯證有關溪流的生態觀，以「水」的書寫介入花蓮在地環境批評，從原住民貼近在地自然環境所發展出的生活模式中，開展其對在地溪河流域的生態知識性論述，並思考在人對自然他者的理解與尊重下，實踐維護自然生態本身之存在價值的可能。此一生態觀的呼籲與書寫策略，在本書第二章〈家離海邊那麼近〉的海洋書寫中，亦有相似的呈現以及不同程度的變形。

## （二）全球海域的科學、文化想像與生態景觀

在〈家離海邊那麼近〉的段落中，吳明益將其海洋書寫分為「虛構時代」與「寫實時代」兩個主要部分。「虛構時代」意指作者透過知識與想像，將全球各地不同時期關於海洋的文化與傳說故事，以及各式人類肉眼可見或不可見、體力可及或不可及的海洋生態景觀，在文本中加以生動的刻畫。「寫實時代」則紀實性的描寫作者長時間與花蓮海洋相處互動的經驗，過程中嘗試從地方生態、原住民族群文化、社會經濟等多重視角，對花蓮地方海域所面臨的現實處境提出文

化思考與環境批評。

文本中的虛構性海洋呈現出兩個不同的層次。一方面，作者援引大量各民族衍生自海洋的歷史與神話，從西方的《舊約》聖經到台灣的原住民神話，從《十誡》裡的摩西過紅海到莎士比亞的戲劇《暴风雨》。這些與海洋相連結的文化來自於先民認知自然的方式抑或文學性的虛構想像，展現了在人與自然仍然維繫著緊密關係的時代與族群文化裡，人類敬海、畏海、同時也戀海的複雜心理，並進而形成了各民族有關海洋的獨特文化內涵。另一方面，作者將關注的眼光聚焦於海洋地生態環境上，時而以雄厚華美的文字堆疊海洋景象，時而又以微觀細緻的剖面細數海洋無數生命的孕育化成，從知性的角度探索或想像這些生物與非生物如何共同形成海洋變化萬千的樣貌與聲音。文本中徵引豐富的科學知識，以之書寫海洋生命史的時間縱深、海域空間的廣闊深邃，以及海水深無可測的力量，此中所展現的其實是人類對廣大海洋世界始終存在無盡的未知，以及人類面對自然時始終須維繫的敬畏與距離，作者藉此試圖在科學化的現代性思維下創造一個適用於今日的「虛構」時代。

作者透過知性的思考、科學與文學的知識背景，鋪寫世界各地關於海洋的文化與生態特性，以及其對海洋的生態觀點與文學虛構性的想像抒發。黃宗潔在探討吳明益的海洋書寫時，將之與夏曼·藍波安和廖鴻基相比較，提出：「吳明益筆下海洋的魅力所在，並非『經驗之海』，而是『知性』與『感性』之海」<sup>8</sup>，並認為其宏觀視野下奠基於科學、文學與神話中的虛構海洋，以及其提出的「身體就是海洋」的思考，反映出作者具體的海洋倫理價值觀。<sup>9</sup> 文本中透過地理

8. 黃宗潔，〈建構「海洋倫理」的可能：以夏曼·藍波安、廖鴻基、吳明益之海洋書寫為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山大學文學院，2009.10.23），頁275。

9. 同上註，頁276。

科學、生物學等科學的角度，論證身體與海洋二者之間本是共生共存的。舉例來說，人類血液與海水的構成比例極為近似，海中與陸上的魚類、哺乳類動物有著相互演化（或「返祖」）的「進」程；地球生成之初原是一個海洋的星球，直至今日海洋的面積仍遠大於陸地等等，諸種實質的物理現象都揭示了人類與海洋生而有之的密切連帶關係，以及人類對海洋可能存在的依戀心理。因此，即便海洋作為一個外部自然環境而存在，人類亦無法僅著眼於文明開發的進程而自外於海洋的生態環境。吳明益將這樣的科學思考作為其生態倫理觀的前提，結合其海洋「虛構時代」向外延展、開放的空間意象，建立以全球生境為單位的海洋生態批評視野。

文本另一部分「寫實時代」的經驗書寫，作者透過對東台灣海岸線的親身走訪踏查，並以之作為文本紀實性的書寫對象，從開闊無邊際的科學、神話與想像的虛構海洋中，將作者的在地性生態關懷落實下來。文本中所書寫的「寫實時代」主要聚焦於吳明益兩次步行東台灣海岸線的經驗，他從花蓮的東華大學出發，一次往北走到了蘇澳，另一次往南行直至接近秀姑巒溪出海口。作者以步行的方式親近海洋，將其對海洋的科學知識與文化想像具體落實在其對花蓮在地海洋生態的觀察上，並進一步結合當地原住民族與海洋緊密相連的歷史、文化內涵，透過東台灣海岸生態與地方發展的現況，進行人類與自然關係的辯證。

如文本中作者描寫新社階地的噶瑪蘭族在清朝時期因遭受漢人勢力入侵，被迫划著小船從宜蘭遷徙至此一濱海的狹小平原生存，他們在這一塊不算富庶的土地上，以耕種與捕魚的方式努力自足，進而漸漸發展出另一種有別於廣大蘭陽平原的部落文化：「新社部落的族



人，就這樣背對著山脈面向海洋，播種、蒔草、收割，形塑他們以貝類、魚、海菜、山中野菜、稻米為主食的味覺，那是介於海與山，流浪與離鄉的味覺。」<sup>10</sup> 從這段詩意性描述中，可看到濱海原住民循著沿岸洋流移動與求生的身影。自清朝開始，漢人勢力漸漸由宜蘭向後山滲透，原住民部落逐步往東尋找新生存空間的遷徙過程，其實也代表了後山漸漸對外開啟的歷史演變。來到花蓮的新社部落族人，除了透過勞力耕種以向土地換取食糧，同時也將海洋視作他們重要的文化景觀與食物來源之一。吳明益描寫族人面向海洋念著祭詞時「彷彿念詩」，其文化的詩意性取之於人、海之間相依共存的關係。文本中此一濱海的東台灣原住民族群興衰演替與遷徙的歷史，所呈現的是人類透過選擇（或被迫選擇）其不同的居處空間，而在尋求安居的過程裡漸漸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用以適應其處所的日常生活與文化模式，透露出一個原住民部落依循外部環境所發生的轉變，以及海洋意象在此遷徙與重新安居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此一族群遷徙的歷史中，也同時映照出後山如何在不同的統治勢力下，漸漸被打開的歷史現實。如文本中有關清水斷崖路段的描寫，作者在行旅結束後翻找《臺灣通史》以查證清朝羅大春開路的歷史，並進一步思及日治時期以至現當代的後山被外力開發與入侵的歷程，以大篇幅的文獻引述與轉述，呈現出人類（漢人、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地加強其開墾與入侵後山的力道，以「如此實際、不可妥協的姿態」開拓通往後山的道路，使得花東的生態、在地原住民生存權利與族群文化等漸次遭受摧殘：

後山終究是會被打開的，只是早些或晚些。……花蓮從踩

10. 同註1，頁116。

在懸崖上的古道時代終於變成雙向通車的公路時代。而未來呢？當「海洋世界」（筆者註：花蓮遠雄悅來飯店）漸漸占據整個山頭以歐式建築為號召面向太平洋，部分決策人士認為只有高速公路才能救貧窮後山之時，後山已再次面臨另一次的「打開」。（會不會也是某種經濟上的「控制」？）只是這一波的「打開」是如此不同，它極可能從此改變此地人民的生活節奏、價值觀跟數百年來與山海交心所形成的深層文化。<sup>11</sup>

文本從開鑿道路的歷史開始，追溯百年前漢人與日本人將勢力漸漸滲入東台灣，造成在地環境與生態資源被迫向侵入者開放，當地的原住民族群文化亦漸次遭受不同程度的消殞；而戰後台灣官方承繼了過往對自然環境的開鑿模式與態度，作者因而從中預示了後山被再一次「打開」的必然性。然而，作者並非捍衛中央山脈另一端為一片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而是反思在這一「打開」的過程裡如何受到資本主義發展進步邏輯所操縱，以及其中以現代化作為唯一地方政策參考取向的迷思。

觀察文本中所刻畫的後山海岸變化圖像，海洋這一不斷向外延展、無具體疆界的特質，如何影響其從過去到現代的生態與文化性意涵。相較於文本第一章〈家離溪邊那麼近〉的書寫，比較溪流與海洋本身在地理形式上的差異性，溪流雖有其支流體系與氾濫的特性，但整體而言不同的流域之間彼此有較明確的界線區隔，且溪流分布於陸地內部，源於高山或湖泊而往海洋的方向前行，在不同的河段展現出不同的地景；相反的，海洋則是一個不斷向外、向深處開展的空間，



海水隨著潮流漫向世界各地，海岸線亦不斷沿著陸地形狀延伸、曲繞而無明確斷點。在這樣的差異特性中，溪流與海洋所孕育的生態樣貌、族群文化、以及其在現代化脈絡下所面臨的開發與破壞等，也呈現出不同的生態、文化之樣貌與意義性，表現在文本中，作者在面對這些自然景物的客觀對象時，在多種的水域生態與文化景觀前，其所開展的記憶、想像、以及生態批評等也各自有所不同。

從上述分析觀之，文本試圖傳遞的海洋生態觀，不僅止於虛構時代裡奠基於科學與文學豐富知識背景的思想馳騁，更進一步的，它是在作者實際以身體親近東台灣海岸線的過程中，觀察在地原住民如何依附山、海、在地生態而形塑族群獨特的文化與知識體系，從而落實了作者以生物區域性為基礎的生態思想體系之建立。從虛構的海洋到寫實的海洋，吳明益透過想像或者思考東台灣海岸在不同歷史時間的脈絡裡所呈現的樣貌，從在地族群的遷徙與興衰、與海洋共織的族群文化及素樸信仰等的探索中，在漫開的時間軸線裡進行一場人類文化與自然生態的緊密思辨。

### 三、傳統生態知識（TEK）與科學科技的辯證

本論文擇取《家離水邊那麼近》「溪流」與「海洋」的兩個章節加以論述，主要原因在於此二者在生態體系上皆具有完整的歷時性演替，且亦深刻的與當地的族群文化發展相互影響作用。然而二者也同時擁有截然不同的特性，就東台灣水域生態環境與族群文化所面臨的現代化開發而言，溪流所受到的影響較具有明確的在地性質，而海洋本身向外延展並串聯各地的流動性質，與各勢力在不同歷史階段向東

11. 同註1，頁154。

台灣移動或入侵的路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性，因此其影響性則更常指向全球。東台灣在多次外力入侵下，當地的環境生態與原住民生存權利，以及其依傍在地自然環境特性所發展的族群文化特質，皆可能面臨崩毀的危機，特別是在這樣的過程裡，隨著科技發展與國家政策制定的權力演進，當代人類已擁有更強大的力量展演其改造自然景觀與操控弱勢他者的能力，因此決策者以什麼樣的觀點與考量來導引一地區的發展走向，遂成為決定後山、以至整體台灣自然與文化之未來命運的關鍵。而在這一以東台灣水域為書寫對象的生態文學中，展現了什麼樣自然與文化間的互動關係與價值辯證，以及作者對地方生態倫理與實踐策略的觀點為何，則是本文在以下討論中所關注的焦點。

在「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簡稱 TEK) 與「科學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對話與辯證中，林益仁引述人類學者 E. Berkes 對於傳統生態知識的定義：「一個有關於生物間 (包括人類) 及生物與環境間關係的知識、實踐、信仰所組成之累積體系，並且經由一連串適應的過程以及文化延續進行世代傳承。」<sup>12</sup> 因此，這一個反映在日常生活細節的傳統生態知識之運用，是由人與其他生物、以及其所處環境之間長期相互作用後所積累的成果，其之於一個人類社群所占有的意義性，甚至影響了整體社群文化與價值觀的形塑。本文探討東台灣原住民族群長期以來依傍溪流與海洋等在地區域的自然生態環境而生，發展出與自然共處、維繫在地生態樣貌的族群生活習慣與文化智慧，即為原住民族群「傳統生態知識」的內涵。而此一傳統生態知識正是前面所述，原住民族群在「生物區域」中的一種展現。以本文之前所探討的新社部落為例，族

人向後山海岸遷徙後，逐漸發展出與鄰近部落的海洋密切相關的文化樣貌。除了在經濟生產與飲食習慣上對海洋產生依賴以外，族人也在每年固定舉辦海洋的祭典，向自然養育族人之情表達崇敬與感謝。在其海祭的祭詞當中，主祭者以荊桐花開的時節標示可以開始捕魚的季節，並從對在地自然環境的觀察與經驗中，遵守自然資源供給的節度。此一漁撈文化中對於魚汛時期的掌握、自然資源的永續等，皆展現出新社部落族人獨特的傳統生態知識。而此一生態知識是源於其對在地自然的細緻觀察，呈現出人與地方生態經過長期密切互動的過程後，在生物區域所發展出的獨特的自然與文化景觀。

此外，林益仁也提出現代科學與傳統生態知識可能存在著「對立」關係，有時甚至是前者凌駕於後者之上。其主要的原因在於，當西方科學試圖以系統化、普世化的方式將在地知識加以收編時，後者的主體性被迫取消而架空了其文化生產的脈絡。<sup>13</sup> 因此，對於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之於當代全球生態保育的運用價值，應正視其在歷史時間與環境空間上的社會生產脈絡，避免以一種浪漫化的懷舊情感與原初想像介入地方生態與文化政治，而忽視在地的現實處境與居民訴求。有關林益仁所提醒的現代科學對傳統生態知識的直接忽視或其他不同形式的壓迫，在於二者之間是在殖民主義的歷史脈絡下彼此相遇，而文化上的殖民更進一步延續至當代情境中，造成西方與東方、現代與原初、全球與在地等的二元對立思維與權力關係。在這樣的狀

12. 林益仁，〈臺灣自然保育的「西雅圖酋長化」：一個從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出發的基進觀點〉，《中外文學》36卷3期（2007.09），頁34。

13. 林益仁指出：「傳統生態知識乃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為適應不同歷史階段的生態環境與社會環境所發展出來的策略實踐，它原本就是變遷的、能夠接受外來因素的衝擊進行相應調整的知識體系……。反之，抽離在地脈絡的西方思維，在推動第三世界的發展工作時，往往以『他者』的眼光同時建構了『傳統』與『現代』的二元理解，反而為原住民文化發展工作的推展帶來衝突與阻礙。」同前註，頁40。

況下，造成傳統生態知識因政治、種族等外部因素的弱勢，而在現代化科學的普遍化裡被抹消、收編抑或加以浪漫化。然而，《家》書中無論是溪流或海洋的章節，皆同時含納了作者實地走訪踏查的寫實性刻畫，以及其透過文學、科學的知識以抒發想像力的虛構性書寫。作者在貼近地方族群生活模式與傳統文化的同時，亦在文本多處加入大量科學知識的符碼，進而對地方生態與相關環境政策進行觀察與批判。

文本透過現代科學與傳統生態知識的交錯書寫，將其作為介入東台灣水域生態環境批判的兩大要素，並不輕易摒棄任何一方。例如文本中書寫花蓮吉安附近的阿美族人舉辦驅蟲祭，族人在祭典中透過簡單的儀式與禱詞，請求昆蟲不要吃他們的農作物，作者在觀看祭典的過程中發出感慨：「我不由自主的羨慕起那個相信昆蟲聽得懂人語，而播種者也願意用溫柔的方式請求昆蟲離開作物的相處方式，那個人可以和山、溪流、海、昆蟲、鳥與祖先的靈魂溝通的時代。」<sup>14</sup> 相對於此，作者也透過科學研究報告的結果，進一步說明現代河川水質呈現出「營養鹽和森林的土地面積成反比，而和耕地面積成正比」<sup>15</sup> 的現象，是因現代耕作改採大量施肥與噴農藥的方式，河流中硝酸鹽與磷酸鹽等含量增高，造成河川水質優養化、藻華以及河川生態系的破壞。透過文本中對於兩種不同作物耕種模式的描寫，可發現此中同時含納了原住民族群文化與科學知識兩個不同的思考面向，呈現出農業文化的變遷如何直接地影響了水域生態系的平衡與運作，以及人類應如何對待土地與自然他者等的環境批判與生態價值判斷。

吳明益在討論台灣原住民文學的論文中，也提出傳統生態知識與

現代科學之間並非對立，而是存在著明確的相屬關係：「原住民族書寫裡所保留的那些智慧警語、浪漫詩意是這個島嶼文化的根，島嶼文化的養分，但別忘了，那也都是無數原住民先民一代一代『試誤』所留下的『理性行為的智慧守則』，和現代科技的正向力量提醒我們的一樣」。<sup>16</sup> 在《家》書中，書寫大量原住民先民與自然共處下所發展出的生存禁忌、生活智慧，以及此中因應生態環境而成形的詩歌、祭典、神話傳說等詩意性文化與生活節奏，代表了一地方人與自然共構的獨特生態景觀與文化意涵。同時，作者也透過科學的知識背景探討地方生態環境的發展走向與維護方式，並從中印證其與在地族群文化在面對自然價值的判斷時，實可殊途同歸的相連性，兩者在文本中彼此交錯呼應，共同構成了《家》書重要的書寫脈絡。

吳明益在其生態批評專書中，也討論到相較於傳統自然文學移情山水的寫作方式，科學／科普書寫之於當代自然文學寫作的內容與策略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他在文中引述科學家艾西莫夫（Isaac Asimov）提出的想法：科學的價值在於對無盡知識的挖掘，並提供人們以更正確或更貼近的方法去認識自然。吳明益進一步說明人們在認知世界時對科學知識的依賴與期待：

他們（筆者註：科學家）不只是從事科學活動，而是在超越「人類的想像力尺度」。那想像力尺度除了知識外還有「未知的美」，因為：「如今我們也無從知道或想

14. 同註1，頁50。

15. 同註1，頁60。

16. 吳明益，〈天真智慧，抑或理性禁忌？——關於原住民族漢語文學中所呈現環境倫理觀的初步思考〉，收錄於《自然之心：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以書寫解放自然BOOK3》（台北：夏日出版，2012），頁94。

像，未來還可以發現哪些無盡的美景——這都需要仰賴科學。」……故事是人類直覺的產物，也是人類思維理性的高度展示。而唯有結合故事與科學家們投注一生所窺探到的真理一隅，我們所信仰的新倫理，才有可能傳遞下去。<sup>17</sup>

引文中可看出吳明益對於科學本身存在的價值予以高度的肯定。科學提供馳騁想像力的空間，以及觀看事物真理的一隅，無論是對當代自然書寫的創作與審美，抑或是人類對日常生活現象或周遭環境的觀察，科學在已然接受現代化的社會脈絡裡持續扮演著開創性的角色。同時，吳明益將「故事」與「科學」二者看似關係甚遠的概念並列，強調唯有同時持有二者，人類才能夠正確、且不間斷的去認識與感知我們所處的自然環境之價值。然而，在《家》書中，吳明益也對現實環境裡人類以不正確態度使用現代科學的狀況提出反思：「有時候一些難以令人理解的決定，我以為或許不是我們對海的認識太淺，而是我們自以為對海的認識已深。」<sup>18</sup> 這裡所說的「海」，其實也泛指整個自然環境，而我們之所以對自然、或對自己產生這樣的誤解，則在於將科學知識無盡放大與濫用，造成人與自然的關係日益切離，掌握現代科學知識與科技力量的人類，雖然擁有了更深入感知自然的機會，反而卻在現代化的文明進程裡失去了自然。

透過對傳統生態知識與現代科學彼此如何相呼應的辯證性思考，作者也依此對花蓮地方政策的走向提出具體建議。文本中引用德國經濟學家舒馬克（E. F. Schumacher）關於土地經營的建議，亦即以維護土地的「健康、美麗、持久、以及伴隨而來的生產力」為四大目標。



吳明益據此更進一步提出其對於花蓮在自然生態維護與人類經濟發展二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的思考：

高速公路和水泥化的海岸都是對山、海和居民健康和美的殺手，而耗損中的農地則減損了花蓮農業未來發展的持久性。舒馬克給我們最大的啟發是，獨特性才是每個地域的文化或經濟得以長久發展的根本，……小經濟體也有屬於自己的機會，我以為這幾年地方政府投入發展的無毒農業、民宿觀光方向正確了，但只能跨出第一步而已，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相信花蓮是最適合實現舒馬克「小即是美」的理想地方。<sup>19</sup>

作者透過踏查花蓮溪流與海洋水域，觀察到官方運用科技力量推動地方工程建設與自然資源開發時，因無視於族群種種在地性智慧對整體生態環境的重要價值，造成了地景與生態系劇烈的改變或摧毀。而引文中對於地方「獨特性」的強調，一方面是重視地方自然景觀與傳統文化的存在價值，另一方面作者亦未否定在現代化社會中推動地方文化與經濟發展時，適度運用科技以開發環境的必然性，但此過程中不能忽略傳統生態知識在一個區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二者之於地方的未來發展與生態維護皆具有同樣的意義性。因此，作者既批判現代一味仗勢科技力量而將自然視為他者，行使宰制性支配利用的價值觀，同時也提出在政府制定政策時，有必要參照在地居民的

17. 吳明益，〈傳遞知識是為了討論價值——臺灣科學／科普書寫中的幾個議題〉，收錄於《自然之心：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以書寫解放自然BOOK3》，頁204。

18. 同註1，頁177-78。

19. 同註1，頁171。

生活形態與文化傳統之建議。在這樣的基礎上，前述引文試圖傳遞以「小」為地方發展取向的生態意識，而從外地移居或前往此塊土地的新移民與觀光者，亦有義務順應此處的生物區域性與文化特性而進行各式活動，在最低程度的侵擾下，實踐以「小」為特色的人類活動模式之地方美學。這是以維護花蓮生態環境與地方文化為前提下，思索如何能夠兼及居民經濟條件與生活水平，使此二者之間可能共進並彼此滋養的具體模式。

《家》的文本創作中，從大量科學知識的鋪陳到地方文化的追索，從地方河川流域的溯源到廣闊海洋的流動性想像，皆呈現出作者對於現代科學知識與傳統生態知識的雙重肯定，以其作為涉入東台灣水域生態書寫與實踐的利器，形塑了文本中既在地又開放的生態意識批評。透過傳統生態知識與現代科學之間的辯證，可以觀察到：在傳統生態知識中，居民會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自身的文化活力與能動性，他們以身體實際感受外部環境所形塑的在地文化智慧，有時甚至更能深入對一個地方的細步觀察；而在現代科學中，如能夠以正確的方式加以運用，其實是提供了人類一個認識與保育自然生態的知識性框架。

#### 四、結語：從生物區域主義到全球生態意識

吳明益在〈且讓我們蹠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一文中，從地理學的角度提出河流與海洋的相異處：「河流在人類社會中常被視為地界……，河流時刻流動，因此具有『非定著』、『時間性』的隱喻存在；再者，河流不像海洋意味著沒有



邊際的浪漫，河流有著源頭，而且終究能找到源頭。」<sup>20</sup> 從溪河到海洋，文本的兩個章節在表現手法、關注面向上存有頗多相異之處，主要原因在於溪流與海洋這兩種水域樣態本身迥異的特質，因此作者對步行不同水域的經驗，在觀看視角與感受上也就有相當不同的呈現。在〈家離溪邊那麼近〉的段落中，作者以其所步行的五條不同的溪流分節，本身便具有這樣的特性。溪流彼此之間有較明顯的區分，因此，就自然生態與人類文化的意義而言，每一條溪流各自可構成一個獨立的系統，棲居溪流旁的族群也依此為天然疆界與主要活動場域，以之作為生存依賴與文化想像的寄託；此外，溪流流域分布於陸地之上，文本書寫的內容因此更聚焦於東台灣生態與族群的「在地性」意涵。相較於溪流而言，海洋並無明確疆界且顯得更為古老深邃，其本身的意象更便於作者延伸想像，因此，在〈家離海邊那麼近〉中，一方面大量描寫全球有關海洋的文化、科學與生態特性，另一方面則從當地原住民族群文化發展的海洋性特質中，反思自外部湧進的現代化發展與思維對後山海洋生態、文化所造成的衝擊，作者在此章節的虛構性與寫實性書寫中，進一步彰顯了海洋的「開放性」意涵。

《家》書中以「家」與「水」的連結開啟全書敘事，透過河與海，展現作者對原住民文化與自然生態共生的意識認同，使這個「家」的指涉，既是在地族群文化性格形塑之起源，更是自然界「他者」在最低程度干擾的前提下的生存與繁衍空間，而成為「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的一種展現：

生物區域主義強調自然因素作為一種想像地方的方式，認為人類的認同可以建構人類在更大的自然生物共同體（a

20. 吳明益〈且讓我們蹀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收錄於《自然之心：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以書寫解放自然BOOK3》，頁242-43。

larger community of natural beings) 中的歸屬——也就是我們在地的生物區域——以取代 (或至少是補充) 民族、國家、種族或其他更普遍的認同基礎。<sup>21</sup> (筆者自譯)

在人類進入這個空間以前，此地早已構成一完整的生態系統運作如宜；在人類加入這個空間以後，人以其文化創造力與情感的依歸認同，將此地變成一個具有多層次意涵，提供想像、思考與記憶的生物區域，這一切其實都奠基於地方生態系統完整的運作，而非民族、國家、種族等政治型態的劃分。不僅止於文本中所刻畫的東台灣水域與原住民文化，包括台灣其他地區漢人為主的農、漁業文化發展，其實也與水域生態密不可分；更進一步的，亦可指涉至全體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在自然中尋找居所建立家園，在水畔獲得維繫生活所需的生存資源，進而形成自身獨特的族群文化、信仰與地方歸屬感，而這些都無可避免的在任一時刻與整個地方生態系統發生密切的關係。

因此，全書中既援引在地原住民傳統文化、歷史考察與其生態智慧，同時透過豐富的科學知識以抒發想像並思考未來環境發展策略，所強調的並非某世代、某族群本真性的不證自明，更指向整體人類對環境意識應有的正確知識的認知：

我不認為我們的上一代，或上上一代，或不同種族，天生比另一群人更天真純樸，順應環境，文化更加睿智。……知識加上感同身受的體諒，才是知道自己對環境造成什麼樣傷害的關鍵，是這兩項東西，讓部分原住民知道他們過去的生活方式也存有價值；也是這兩項東西，讓部分都市

人發現自己的生活在不覺中傷害了些什麼；是這兩項東西，讓一些人覺得某種價值更適合我們去嘗試，而某些行為或許應該考慮遺棄到人類文化的墳場裡。<sup>22</sup>

文本中對於「知識」與「感同身受」這兩項重要元素的標舉，前者指向現代科學與傳統生態知識的互補並進，後者則指向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所釋出的善意。作者以此二者為橋梁，使原住民與都市人原來相互抵觸的生存空間、生活模式與生態價值觀等，有了對話與提供參照的可能。藉此，文本中對於東台灣水域生態與原住民族群文化的書寫，不但在現代科學（都市文明）與傳統生態知識（原住民文化與生活模式）之間關係的辯證上提出回應，也進一步開展出自然之存在價值的普世性思考，亦即捍衛自然生態本身的存在意義須優先於人類開發的進程，人類的文化價值才可能從中進一步地體現。

以作者在文本中所傳遞的普世性生態意識為媒介，可進一步將文本對東台灣「在地性」的水域生態批評，導向一「全球性」的生態倫理觀與整體人類文化的關懷。前述 *The Bioregional Imagination: Literature, Ecology, and Place* 論文集編者針對一般認為生物區域主義僅關注於在地的環境問題，而無法將視野擴及全球整體生態這樣的觀點，進行以下的回應：

我們完全贊同在地化的地方感（localized sense of place）若沒有併入更廣大的生物圈以及全球文化與經濟網絡而加以擴大，將會是不完整的。但我們也認為，如果沒有意識

21. Tom Lynch, Cheryll Glotfelty, and Karla Armeruster, *The Bioregional Imagination: Literature, Ecology, and Place*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2), p. 4.

22. 同註1，頁68。

到全球是一個多種規模與構成形式的 (variously scaled and nested) 地方極盡複雜的連結，或是沒有意識到這些地方即為所謂的生物區域，那麼全球感也同樣是不完整的。<sup>23</sup>  
(筆者自譯)

也就是說，我們可將生物區域主義視為全球生態意識的一種在地展現，每一個地方與族群所發展出的與在地自然共處的傳統生態智慧，皆同時存在於全球生態系統當中。在以全球為同一個生態系統的交流循環下，世界各地所發生的各種環境異常現象，如環境汙染、氣候變遷、地球暖化、生物多樣性漸趨衰竭等，其實也同時是以全球為單位不斷地進行著。因此，如何以區域生態為前提而形塑在地性，與族群文化認同加以連結，進而與全球的生物圈、文化、經濟網絡加以連結，成為當代開展生態意識的重要課題。

與此相呼應，吳明益也主張台灣島嶼在地居民與自然相處時所發展出的種種生活經驗與文化智慧，「都意謂著一個可以支持全球生態智慧「地域性認知」的在地文化、在地經驗，他們透過根系，理當與全球那個大環境聲息相通」。<sup>24</sup> 因此，在地經驗與區域環境是以「根系」的形式支撐著普世性的當代生態意識，二者互為主體，與現代科學脈絡下所發展出的全球生態智慧並行不悖。在這樣的思考下，吳明益《家離水邊那麼近》中東台灣的溪流與海洋之生物區域景觀，所強調的非僅止於原住民的在地歷史處境與文化政治，我們可藉由海洋在地理形式、文化想像與自然生態上的開放性質，將其書寫連結到生態意識的普世性價值判斷，使人類在面對周遭的在地生態議題時，能夠擺放到全球框架底下認知與思考。

## 參考資料

- 吳明益，〈《台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BOOK1》〉（台北：夏日出版，2012）。
- ，〈《自然之心：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以書寫解放自然BOOK3》〉（台北：夏日出版，2012）。
- ，〈《家離水邊那麼近》〉（台北：二魚文化，2007）。
- 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阿美族》〉（台北：臺原出版社，2001.10）。
- 黃心雅，〈風險、海洋與原住民能動：艾佩利·豪琺與夏曼·藍波安的「群島之洋」〉，劉石吉、王儀君、張志維編，〈海洋、跨界與族裔〉（高雄：國立中山大學，2010），頁1-25。
- 林益仁，〈臺灣自然保育的「西雅圖酋長化」：一個從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出發的基進觀點點〉，《中外文學》36卷3期（2007.09），頁15-61。
- 林柳君，〈吳明益作品中的文化轉譯、美學實踐與隱喻政治〉（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文所，2011）。
- 黃宗潔，〈建構「海洋倫理」的可能：以夏曼·藍波安、廖鴻基、吳明益之海洋書寫為例〉，「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山大學文學院，2009.10.23）。
- Thayer, Robert L. *LifePlace: Bioreg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Lynch, Tom., Glotfelty, Cheryll. and Armeruster, Karla. *The Bioregional Imagination: Literature, Ecology, and Place*.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2.)

23. 同註21，p. 9.

24. 同註16，頁92-93。